

国……时医多有露者,取其清冽之气,可以疏滯灵府,不似汤剂之膩滯腸隔也。”书中还广集了各种露剂和芳香油。其三,不但传入了一批外域药物,而且西方药学专著开始翻译。传入之药物中,因金鸡勒曾治愈康熙之疟疾,而被称为“圣药”,在当时倍受重视。其余药物中,有的(如西洋参、胖大海等)应用价值较大,至今仍为临床常用;有的(如冲鼻水、强水等)与中药差异甚大,难于合璧,未能在此后的本草中占得一席之地;有的因药效不确,如洋虫之类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又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有吸毒石、吕宋果等,始出“泰西石振铎《本草补》”,据考证,该书作者为墨西哥传教士,该书为现有记载中最早的西方药学译著。

在这次传入高潮中,西医药学本身尚不成熟,所用药物的临床疗效与中药相比,除个别品种外,实无优势。直至19世纪中期,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内科新说》中仍不得不提出“药剂以中土所产为主”的办法。所以,上述零星的药物和制药技术传入后,基本上都被纳入本草的原有体系,为中医药所用。

近代西医药的传入自19世纪开始。随着实验医学的建立,西医药学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接近全盛时期,出于侵略和掠夺的目的,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创办医院、医药学校和药厂,并且吸收中国留学生,出版译著和刊物。面对国势日衰,大批中国学者更加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西医药迅速在华夏大地广泛传播。

自1805年英国的皮尔逊来华行医算起,到1840年止,仅有10余名西方医生在澳门和广州一带活动。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西方医生人数渐增,行医范围迅速扩大。截至1905年,教会医院已达166个,诊所241处。早期的教会医院招收有少量中国生徒,继后则直接兴办医科学校和吸收中国的留学生,开始了我国的西医药教育。

为了保证在华医院的用药需求,并攫取高额利润,外资药厂(房)也应时而生。如1853年英商在上海建立的老德记药房,到1889年已成为拥有12万元资本的股份公司,并先后在天津、汉口、芜湖等地设有分店。

这一时期译著的西药书籍,不仅数量增多,而且比较系统。主要有美国人嘉约翰(John Kerr)与孔继良等合译的《西药略说》、《药物学手册》、《西药名目》;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与赵元益合译的《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录》、《药理总考》和德贞(John Dudgeon)的《英国官药方》、《药物名词词汇》、《药物及治疗学》、《治疗及药房手册》;美国人洪士提(S. A. Hunter)的《万国药方》等。清末,国内医药专业人员也开始翻译西医药书籍,如丁福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西药的传入,不仅使中国人民又多了一种防治疾病的有力手段,而且还对中国的医药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学成的西药药科人员,虽不乏执有偏见和盲目反对中医药者,但在临床、制药、教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药的现代研究准备了一批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在日后的中药研究或本草考证方面取得了成就。与西药理论、研究方法、制剂技术和某些特效药疗效显著相比,本草学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暴露出来,人们对传统药学开始进行反思,中西医药的论争已在酝酿之中。

第九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本草学 (1912—1949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7—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抗战,赶走了日本

侵略者。随后又经历3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经济衰退,城乡广大人民都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之中。在思想文化上,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爱国志士企图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积极介绍和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学技术。接着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人士接受了马列主义,用唯物史观来观察问题,主张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的同时,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已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有不少学者,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国际科学技术界的重视。

这一时期的医药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急于想打开中国的大门,利用医药为先导,派遣大批医务人员来华开办医院、诊所。又创办了一批医药学校。随着西方医药学的广泛传布,在我国出现了中西两种医药学并存的局面。与此相应,社会上和医药界逐渐形成“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的名称。

由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奉行扬西抑中的政策,企图以行政命令取消中医,从而出现了废止与反废止的斗争。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中医组织的“医药救亡请愿团”代表时说:“我今后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公开表明了政府废止中医的态度。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声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并提出取缔中医的六项措施。这个提案通过后,全国有15个省、132个中医药团体代表262名立即云集上海,成立“全国中医药总联合会”,进行声势浩大的抗争,终于迫使这个议案未能核准执行,但却给中医药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严重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医药为中国人民健康事业和民族繁衍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厚爱。在民国时期,中医药人员的数量和行医范围远远超过西医,在全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占居主要地位。当时身处逆境的中医药工作者,在学术上奋发图存、锐意进取,尽管困难重重,中医学依然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的地区对中医药十分重视,中医药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中医药的普及、培训,努力运用中医药防治疾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本草文献

民国时期本草著作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现存者有260多种,大多体例新颖,类型多样,注重实用,还出现了吸取现代科学或与西医药理论汇通的新著作。

(一)《本经》的辑复和注释

此时,对《本经》的注释,更注重实用,资料较丰富。如孙子云所著《神农本草经注论》,书成于1929年,全书2卷,收载药物321种,对所载各药皆“观其形,察其色,嗅其气,咀其味,考其产地,评其性别”。每药列注、论两项。“注者,注释经文之字句及药之气味、色性之功能;论者,比较各药之异同,指出误用利弊,并解疑义”。阮其煜、王一仁的《本草经新注》,书成于1933年,载药280种,该书以西医药理论对药物性味、主治、功能,逐一注